

海外华侨华人发展史及与祖籍国关系概述

一、华侨及其出国原因

1. “华侨”名称的由来及其含义

在中、外史书上曾称“华侨”为“唐人”、“华人”、“中国人”、“中华人”，也有称之为“华民”、“华工”、“华商”者，其含义均指移居海外的中国人。19世纪末叶才开始使用“华侨”一词，并经孙中山先生建立的同盟会会员的广泛传播，成为侨居海外中国人的通称。

二战后，又出现“华人”、“华裔”、“华族”等名称，其含义也有所不同了。“华侨”是指具有中华民族特征、移居海外而仍保持中国国籍的人，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其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理应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华人”是指具有中华民族特征、移居海外并已取得当地国籍的人，他就不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其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他就不能获得中国政府的保护（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是正确的，而台湾当局迄今仍主张双重国籍）。但这并不排斥中国人民基于共同的民族立场对之进行某种形式的声援与支持（如阿拉伯国家人民对于别国公民中阿拉伯人、英美等安德鲁撒克逊族为主的国家对别国安德鲁撒克逊族的支持），当然不用政府名义

发表声明或抗议等；另一方面，也不排斥华人按所在国的法律程序脱离该国国籍，重新申请为中国公民，而取得中国政府的保护。

“华裔”是指中国人的后代，具有中华民族的血统（如前泰国总理、前菲律宾总统等都说自己有中华民族的血统等）；但和“华人”怎么区别呢？是个难题。有的专家认为，可以出生的代数为划分标准，在当地出生五代以内为“华人”，超过五代者为“华裔”；有人主张以民族的意识、感情为标准，具有中华民族意识和感情者为“华人”，否则为“华裔”；还有的学者提出以是否同中国有联系为标准，有联系的为“华人”，反之为“华裔”。总之，意见不一，界限很难划清。

“华族”则是指华人、华裔在所在国已形成一个民族（一般说，形成一个民族要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目前只有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少数国家使用“华族”这个名称。

2. 华侨出国的主要原因

华侨出国的原因较多，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

历史上中国人民因战乱或改朝换代而大规模地逃亡到国外定居者共有 6 次：唐末黄巢起义（公元 875—884 年），广东沿海有些人逃往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在南洋群岛出现了最早的华侨；②南宋亡国（公元 1279 年），一帮文武大臣流离海外；

明代后期因反对压迫而聚众出国，如万历二年（1574 年）林凤率战船 60 艘进入菲律宾吕宋岛，万历六年（1578 年）林道乾率众由台湾逃至泰国南部的北大年定居；明清易代之际（1679 年），明总兵杨彦迪等率兵 3000 多人投奔越南，开发东浦；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部分太平军退入越南、老挝、泰国避难；⑥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一些与国民党政府关系密切的

和不明真相的富有者逃往东南亚、欧美等国。

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对外用兵，也常有战俘和失散的官员羁留外国不返回者。如公元 1288 年元朝同越南交战，在白藤江一役中，4 名元将及大批士兵被俘不归。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清军进攻缅甸失败，被俘 2500 人，羁留缅京，从事种植或工艺，娶缅甸女为妻等等。

第二，殖民掠夺方面的原因。

西方列强为了掠夺殖民地丰富的自然资源，急需大量的劳动力进行开拓垦殖，在欧洲禁运黑奴的条件下，便采取两种血腥措施掠夺中国劳动力。一是公开地抓捕，如 1619 年荷兰殖民者抓捕中国商船上的水手及商贩 2000 余人到吧城（现在的印尼首都雅加达），强制担负建筑、种植劳务，开发爪哇岛；1623 年在吧城的荷兰总督柯恩竟凶相毕露地发出指令：“现值季风正顺，须再遣战船往中国沿海，尽量掠其男女幼童以归。”“世间无如华人更适我用者。”

二是采取诱骗中国人“卖猪仔”供其奴役压榨。19 世纪中叶，英法等帝国主义列强，需要大批劳动力开发其占领的殖民地，纷纷通过其在华的洋行，重金雇用当地的流氓地痞拐骗沿海一带的农民、手工业者，以“卖猪仔”的方式下南洋当“估俚（苦力），最初每名是 3 元银洋，后涨至 8—10 元银洋卖给“猪仔船”运抵南洋各国口岸实行拍卖，每名到岸价格一般是银洋 120 元，最高价为 200 元。当地人贩子再转售给大种植园主、大建筑公司，单价高达 400—500 元。这些中国“奴隶”被打死、打伤或经受不住残暴奴役而自杀的不计其数。这种“猪仔工”起初没有什么期限，后来由于中国劳工的反抗才有一定的契约时间。据我国侨史专家的估算，当时每年出国的“猪仔工”与“契约华工”约有 300 万人，平均有 1/3（即 100 万人）死亡、1/10（即 30 万人）病伤残废，真是与非洲黑奴

一样的人类历史上的大惨剧。

第三，经济、生活方面的原因。

这是旧社会促使华侨源源不断移居海外的主要原因。从中国方面看，人口过多，谋生困难（特别是地少人多的东南沿海省份），如 1935 年广东省人口约 3000 万人，福建省人口约 1400 万人，共计 4400 万人。同年海外华侨 780 万人，其中粤闽籍的为 700 万左右（即占华侨总数的 90%），约占这两省总人口的 1/6（如仅统计广东的四邑、海南、潮汕、梅县和福建的漳州、泉州，则华侨约占这些地区人口的 1/3）。这些沿海地带山多地少，人口增长很快，社会动荡不安，官吏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走投无路的中、青年人，只好飘洋过海，投亲靠友，寻找生路。

从外部条件看，西方殖民者东来之后，需要吃苦耐劳肯干能干的劳动力，为其开发新占领的土地、矿井和森林等；需要精明节俭、善于经营的零售商人，为欧人资本家收集商情、采购原料和推销商品。这两方面的人员，很难得之于当地土著，而华侨无论从数量和素质，都是殖民者所需求的适当对象。随着中国国内农村破产、民不聊生和殖民地的经济发展，我国移居海外的人数日益增加，形成今日散布全球特别是东南亚各国的华侨群体。

二、华侨历史的上限

中国人移居国外，作为一种群体现象、经常现象出现于社会历史中，形成华侨历史，究竟始自何时（即华侨历史的上限）？中外侨史专家看法不一，迄今仍在探索研究，但大体上有两种说法：

1. 东南分期法

以海路为主移居东南亚各国的历程，来研究华侨历史何时开始，分为几个历史阶段，叫做“东南分期法”。国内相当一些专家采取此法，但他们对侨史的上限的看法也各执己见。比较有影响的见解有二：一种认为华侨史自唐朝起始；一种认为自南宋开端。前者的依据是：唐代南海交通贸易空前发达；华侨被称为“唐人”，说明当时已有大量中国人移居海外，并引用中外史籍（如杜环的《经行记》和尔马素地的《黄金牧地》等）作为论据。后者的理由是：宋代的经济重心南移，闽粤人口激增，没有土地可耕的村民被迫持续不断飘泊南洋；商品经济（主要是经济作物和轻纺产品）空前繁荣，导致纸币问世（纸币流通比欧洲早几百年），对外贸易日趋活跃；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三大发明都在宋代，特别是指南针的应用使造船、航海技术有长足进步，中国人的船只用指南针比阿拉伯海、地中海航船早得多，这时候除传统的西洋航线外，我国水手又开辟了通往菲律宾、婆罗洲诸岛的东洋交通线，为华侨大量出国提供舟楫之便。笔者比较赞同后者的学术创见，因为这方面的史料较前者充分、可信。

2. 东北分期法

则以陆路为主移居西亚、东北亚各国的历程，作为研究侨史上限和分期的导向，显然与“东南分期法”不相同。这种主张的学者虽不多，但他们提出值得思考的新见解。

“东北分期法”认为，中外陆路交通比海上交通发生时间要早，如夏朝外贝加尔湖（今日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居民与我国黄河流域就有陆上往来；但华侨从中国西北陆上移居外国这种历史现象发生于两汉时期，特别是张骞通西域以后。

从我国东北方面看，这里也是中国人移居国外的发源地之一。秦末汉初，燕国人卫满带领千余人亡命于朝鲜（大约在公元前 226 年秦破燕后），开创了古代辽宁人移居国外的新阶段。

史载卫满于公元前 194 年（即汉惠帝刘盈元年）夺取朝鲜政权，自立为王，采取“诱民政策”，移居朝鲜的中国人日益增加。因此，两汉时期辽宁籍华侨移居朝鲜是中国华侨史的开端，比“东南分期法”中的始于唐代一说，至少要早 400 年左右。

然而，辽宁籍华侨并非以移居朝鲜为终点，公元 2 世纪（东汉时期）以后，又不断迁入日本。日本的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称旅日华侨为“归化人”。总之，辽宁籍为主的朝鲜华侨、日本华侨的形成，是中国华侨史上限的基本依据之一，说明辽宁籍华侨在我国华侨历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三、华侨是所在国的社会支柱

广大刻苦耐劳、诚实勤俭的华侨，与所在国的人民和睦相处，同甘共苦，受到社会的好评，连当地的苏丹土王、殖民当局也不得不承认，特别对南洋群岛、北美大陆的开发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华侨还在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与所在国人民并肩作战，流血牺牲，建立卓著的功勋。

1. 华侨对所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马来西亚迄今仍然是世界最大天然橡胶生产国、锡生产国之一，没有百多年前广大华侨在马来半岛含辛茹苦、前仆后继地种植、开采，那是办不到的。史书记载，从 17 世纪起就有大批华侨在马来各邦开采锡矿，到 20 世纪初，采锡华工约有 30 万人，马来亚锡矿几乎全部是华侨所经营。天然橡胶原产于南美洲，1876 年开始由英国人引入马来亚，是华侨陈齐贤独具慧眼，敢于在马六甲带头试种，获得成功后，带动了大家发展橡胶种植业，不过 50 年左右，就成为全球最大天然胶生

产国与出口国。陈嘉庚先生就是当年的“橡胶大王”之一。

华侨对泰国的经济、文化建设的贡献，也是该国朝野人士所公认的。首先，移居泰国的华侨传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如帆船制造、远程航海由华侨担任，胡椒和甘蔗的种植，锡矿的开采，瓷器、制糖、铸铁三大行业的扩展，无一不是华侨传授技艺和发挥生产骨干作用；在建筑上，像国王的宫殿、曼谷的大佛寺等，多直接仿效中国。其次，华侨也将文化艺术带进泰国，如 1802 年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三国演义》、《西汉通俗演义》译成泰文，形成泰国的“三国文体”；泰王拉玛二世还下令翻译《东汉通俗演义》、《东周列国志》和《封神演义》；泰国许多歌剧也直接取材于《三国演义》，中国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

美国华侨在开发美国西北部荒凉地带流血牺牲，功绩卓著：一是兴建铁路，1862—1864 年间，美国兴建横穿大陆的联合太平洋线、中央太平洋线两条大铁路，绝大部分工程由华侨劳工承担，先后参加筑路的华工有四五万人，因筑路而死亡者不下万人，可以说每英里铁路都有中国人的白骨垫基。铁路建成后，移民西进，加速钢铁工业、农业的发展，对美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发挥巨大作用。二是开垦荒地，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州志记载：中国工人推动独轮车，筑起堤防，将该州 42.5 万英亩的沼泽地开拓为良田，使每英亩地价由原来 1 美元升值到 20—100 美元。三是开矿，初到美国的华侨，干这种最繁重最危险的活计最多，为美国资本家创造数不清的财富，有人说几乎每张美国钞票都含着中国人的血和汗，绝非耸人听闻之谈！

在朝鲜的华侨为朝鲜半岛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也是众所周知的。例如：农业方面，山东籍王姓、姜姓两位华侨从烟台运进菜种，在仁川种植（1887 年左右），

使当地蔬菜业面貌一新，不到 30 年时间，就使仁川、富平一带成为供应朝鲜各地的蔬菜基地。商业方面，在日本占领之前，朝鲜华侨是流通领域的主力军，对促进生产发展、方便人民生活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当时有家广东籍华侨经营的“同顺泰”商行，独家收购销售有名的朝鲜红参，信誉卓著，所发行的“银票”甚至比朝鲜政府的纸币更受欢迎，朝鲜银行 1941 年的《经济年鉴》曾这样写着：“朝鲜华侨在旧韩国时代是全盛时期，掌握着雄大的经济实力。”甚至日本统治朝鲜初期，汉城、仁川的八大家批发庄（华侨创办的），还可由中国输入江浙绸缎、川赣夏布、华北的粮棉及干菜（辣椒、大蒜等），且数量相当可观。工业方面，华侨工人尤其是技术工人主要集中在平安北道、京畿道等 6 个道，是当时朝鲜工业的骨干力量，因为他们的原籍是山东、华北、东北，距离不远，来往极为便利；当地人工作效率较低，而日本人工工资又高，大量采用华工是挺合算的。可见华侨对朝鲜工业发展也是立下巨大的汗马功劳。

最早到南非做工的华侨，大约在 18 世纪中叶。因为欧洲殖民者相继侵入非洲，残酷屠杀敢于反抗的居民，后又大肆贩卖非洲“黑奴”，造成包括南非在内的大片殖民地劳动力奇缺。据 1904 年统计，仅是好望角一地就有华侨 1393 人。19 世纪 60 年代南非发现金刚石、70 年代发现金矿，掀起一股淘金热。英国垄断资本家为独占金矿产地，挑起了 1889—1902 年的“英布战争”。约有 15 万非洲矿工的黄金产区因战火波及而纷纷离散，相继改行垦荒。金矿资本家通过英国在华的代理人从我国的山东、山西、河南一带招募华工（因这个地区有煤矿，且气候似南非，工钱又便宜），自 1904—1906 年三年中，共输送 55000 名华工到南非，成为恢复金矿生产的主力军，为南非的经济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石。

至于华侨在古巴、秘鲁、圭亚那、巴拿马等拉美国家生产领域与流通领域的作用与贡献，不少史书都有记载，就不一一列举了。

2. 华侨与所在国人民同心协力反帝反殖

中国人是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从善如流、敢于抗暴、不屈不挠的民族，哪怕在天涯海角、异国他邦也绝不会改变这种优良的民族性格。因而多少世纪以来，华侨不但对所在国的经济、文化建设作出卓越的贡献，而且同当地人民一道反对压迫剥削、反帝反殖、反对法西斯战争和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

菲律宾华侨为了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暴政和残酷的剥削，自 1593 年（明朝万历二十一年）到 1763 年（清朝乾隆年间）的 170 年间，曾经掀起六次抗暴斗争，而且一次比一次激烈。尽管有 57200 多人被穷凶极恶的西班牙殖民军杀害，但起义的华侨曾经击毙了西班牙总督和西班牙区长，而且前仆后继，从未向殖民者低头屈服。

1898—1899 年菲律宾独立战争时期，多数华侨站在革命政府一边，和菲律宾人民并肩反抗西班牙和美国的军事侵略。他们筹措几百万比索资助革命，他们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英勇献身，有几位有重大贡献的华侨、华裔，菲律宾人民永远怀念他们：黎刹——他具有华人血统，祖籍福建泉州南门外上廓乡，他是名医、科学家、文学家，为菲律宾独立运动领袖，不幸被殖民者逮捕，于 1896 年 12 月英勇就义，被尊称为“菲律宾革命之父”。刘亨赠（fù）——福建南安县码头乡刘林村人，18 岁（1890 年）赴菲，在伯父打铁店当学徒，学会制作铁器和老式火药枪技艺。1896 年菲律宾独立战争爆发后，他参加革命队伍，成为步兵中尉，翌年他指挥部队击毙了殖民军首领佩德罗·萨瓦拉将军，并接连打了胜仗，晋升为上校，1898 年因

动员华侨捐赠几十万比索给革命军，成绩显著，被授予准将军衔，菲律宾百姓亲切地称呼他为宝阿将军。1926 年他逝世时，菲政府为他举行国葬，并命名一个村镇为“宝阿”（Paua）以纪念他。王彬——他祖父是福建省晋江县人，他本人有 3/4 的中国血统。由于经营百货业有方，成为马尼拉的富商之一。他曾因大量财物赞助菲律宾独立而被殖民当局逮捕，出狱后仍然坚决支持革命，深受菲律宾人民的爱戴。1910 年病逝，后来马尼拉市议会决定将华侨聚居的沙克里斯蒂亚街（St. Sacristia）改名王彬街，并在街口建立名为“中菲友谊门”的纪念牌坊；1973 年又在友谊门建立王彬的铜像和纪念碑，供人瞻仰。

印度尼西亚著名的“红溪事件”（又名“红河惨案”）是发生于 1740~1743 年的一次华侨和印尼人民联合反抗荷兰殖民主义残暴统治的起义。当时咖啡、蔗糖生产“过剩”，荷兰占领下的印尼发生经济危机，殖民者制造种种事端掀起排华恶浪，1740 年 7 月下令：被认为可疑的华侨，不论有无许可证，都要逮捕待审；诬陷“服鸟衫裤之唐人……日间为好人，黑夜即为贼”；“若见服鸟衫裤者，俱皆擒拿”。同年 10 月初，荷兰东印度公司命令将所有在押华侨连夜用船装运出海，绝大多数被杀害，其余的则被投入海中，激起广大华侨的义愤。聚集在甘达里亚（Gandaria）糖厂周围的 5000 多名华侨，推选黄班为首领，准备武装自卫，但被叛徒林楚告密。当局以华侨想进攻吧达维亚为借口，在吧城展开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大火连烧三昼夜（1740 年 10 月 8 日—10 日），包括在监狱里、医院里的华侨都在斩尽杀绝的范围内；殖民军头目范·田霍夫还炮轰华侨聚居的小南门外郊区，将其夷为平地。这次浩劫，约有 4389 名华侨殉难，鲜血使溪流变红了，人们称之为“红溪事件”。

在吧城大屠杀的危急之秋，黄班率领 18000 多名华侨起义

军五次攻城想拯救城内的骨肉同胞，但终因武器落后而失败，1741 年 6 月撤至勃良安地区坚持斗争。中爪哇也有两支华侨起义军，在马打蓝苏丹巴固·布沃诺二世的支持下，占领了荷兰殖民军堡垒，杀死了荷军司令官，并占领爪哇岛东部一带的若干沿海城市，声势浩大。后来由于苏丹向荷军投降，华侨起义军内部分裂，包围四个月之久的三宝垄（中爪哇最重要城市）解除了，华侨起义军寡不敌众失败了，抗战派首领黄班只身逃往巴厘岛。

沙皇俄国的华侨，虽然数量不多，但也是一个“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英雄群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急需劳工，华侨大量入境，仅 1916 年就输入 49272 名，除北极圈以外，俄国各地都有华侨在干热、脏、累的活计。沙皇政府称华工是“一群古代奴隶”，极尽压榨之能事。如在摩尔曼斯克铁路做工的华侨，工作长达 12 小时，没有节假日休息日，工钱只有同工种俄国人的一半，连最起码的劳动保护条件都没有。残酷的剥削和难以容忍的人身侮辱激起华工的反抗，1915 年 11 月，古巴哈煤矿 17000 多名华工暴动，捣毁了矿场事务所；1916 年 5 月 25 日阿拉帕耶夫斯卡伐木区 2600 余名华侨罢工，州政府调动军队镇压等等。因此，广大华工积极支持 1917 年爆发的“十月革命”，有 1500 人参加红军，组建了“中国团”，由任辅臣担任团长，编进红军第三军团第二十九狙击师，屡立战功，后被苏维埃中央命名为“红鹰团”。1918 年该团有 70 多名华侨战士被调往彼得堡斯莫尼宫担当列宁同志的警卫。可见革命领袖对中国同志的无限信任和华侨红军确实为人类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诞生贡献了应有的力量。

3. 华侨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立下不朽功勋

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简称为“华支”）——这支队伍的总队长黄杰（即王汉杰，曾任国家重要领导职务）。1941

年 12 月 7 日，日寇在偷袭珍珠港之后 9 小时，猛烈轰炸马尼拉市，并在 1942 年 1 月 2 日占领它。菲律宾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华侨的遭遇就更惨，日寇甚至践踏国际公法，杀害中国驻菲外交官员。当时的“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简称“劳联会”），组织部分华侨青年建立“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在城市坚持地下斗争；发动另一部分华侨青年到中吕宋参加菲律宾人民抗日武装部队。由于菲、华战士语言沟通有困难，风俗习惯不同，有些实际问题不易解决，同时为了组织更多华侨青年参军，便于 1942 年 5 月 19 日单独成立“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也叫“四十八支队”，中吕宋、南吕宋的人民习惯称它为“Forty-Eight”。

“华支”组建时，52 人，只有一支短枪，一支枪托被火烧过的步枪和两枚手榴弹，队员还缺乏训练。他们以八路军、新四军为榜样，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夺取敌人的武器、弹药武装自己，同菲律宾人民抗日武装并肩战斗，在三年多转战吕宋岛的 14 个省和马尼拉市，大小战斗 200 多次，歼敌 2000 多人。到 1945 年 1 月向日、伪军发起总反攻时，“华支”已经发展到五个大队约 700 多人。这支英雄的队伍，在 1945 年二三月份，曾配合美军攻入马尼拉市，同日寇展开激烈的巷战，保护侨胞的生命财产；曾在抢救罗斯刀牛集中营的盟国难民战斗中，奋不顾身，首先冲入集中营及时救出 2000 多名盟军战俘和盟国难民，受到盟国军方的嘉奖。1945 年 7 月 4 日，菲律宾全境光复，“华支”有 70 多位队员光荣献身，人民在马尼拉华侨义山建立了一座“菲律宾华侨抗日烈士纪念碑”，让后人永远缅怀他们。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1941 年 12 月 8 日凌晨，日寇的舰队满载三个师的官兵偷偷驶向马来半岛东海岸。日军两个师在泰国的宋卡、北大年兵不血刃地登陆，直插泰马边境；另一个

师在马来亚吉兰丹州的哥打巴鲁，同一个旅的印度兵激战一番后，也顺利登陆了。日寇空军也在这天 4 点多钟空袭新加坡。由山下奉文指挥的侵略马来亚的战争开始了。

同年 12 月 10 日英国两艘主力舰“太子号”、“击退号”又被日机炸沉。英军望风而逃，日寇长驱直入，在 55 天内竟推进 1100 公里，占领整个马来半岛。在新加坡岛沦陷前夕，成立了“星洲华侨抗日义勇军”，拿起旧式武器，在北郊及沿海地带浴血奋战了几昼夜，打掉了日寇所向披靡的嚣张气焰，写下了“保卫星洲”的壮烈诗篇。正当军民同日寇巷战之际，英国驻马来亚陆军司令白思华向山下奉文屈膝投降了。

日寇搞所谓“大检证”，对华侨进行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在新加坡有 2.5 万人被杀害，在柔佛州等地有 10000 多人牺牲，其他各州也都有不少华侨遇害。哪里有压迫哪里必然有反抗，在马共直接领导下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于古城马六甲成立了，下辖 8 个独立队，以华人为主，也有马来人、印度人及少数民族参加。他们以原始森林为营地，在粮食、武器弹药、医疗用品非常缺乏的条件下，同日寇展开了激烈的游击战争，大量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华侨抗日军也于 1942 年 2 月在霹雳州一带活动，后与洪门游击队合并，在马来半岛北部抗日。马来亚华侨抗日武装在丛林沼泽地带转战了三年八个月，与盟国军队紧密配合，终于战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丰功伟绩将永载青史。

四、华侨对祖国的奉献

伟大的祖国是华侨的故乡，是华侨的靠山，而孙中山先生又赞扬“华侨是革命之母”。

1. 华侨对辛亥革命的重大贡献

辛亥革命时期（1902—1908 年这一阶段）遍布五大洲的华侨估计 700~900 万人，他们的辛酸遭遇和爱国热情促使其全力以赴地支持辛亥革命。首先是为革命筹措巨额经费，历次起义武器采购费、士兵的粮秣费、革命组织活动费、舆论宣传费等，绝大部分是华侨资助的。如“黄花岗之役”的军费，原计划筹集港币 13 万元，结果募捐到 18.7 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捐款 8 万元港币、美洲华侨捐款 7.7 万港币、其他地区华侨捐款 3 万港币）；越南西贡市华侨李卓铎一人就为防城、河口、镇南关（今友谊关）等地的起义捐助几万元军费。武昌起义一开始，各地华侨的捐款更是空前踊跃，仅 1911 年中南洋群岛的华侨就赞助五六百万元，侨领陈嘉庚先生个人捐献了 5 万元给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孙先生说侨胞的捐助是“不图丝粟之利，不慕尺寸之地”，“一团热诚，只为救国”。特别感人的如华侨资本家林受之为了革命倾家荡产，以致子女不得不去当雇工；港商李柏（李纪堂）捐助革命军费，前后约 100 万元，几乎是全部家产。

其次，直接参与武装起义。广州起义（1895 年）、惠州起义（1900 年 10 月）、镇南关起义（1907 年 12 月）、河口起义（1908 年 4 月）等都有华侨参加；而 1907 年 5 月的潮州黄冈起义还是新加坡侨胞许雪秋指挥的，同年 6 月新加坡华侨邓子瑜又指挥了惠州七女湖起义。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 1911 年 4 月 27 日的广州黄花岗武装起义，马来亚约有 500 名华侨志士回国参加，越南华侨打石工友石锦泉率领敢死队到了广州，缅甸、荷属东印度等地的侨胞也踊跃参加。这支以南洋华侨和日本留学生为主的敢死队在黄兴指挥下进攻清朝总督署，英勇奋战，气壮山河，但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了。战死沙场和被捕就义的共有 72 人，其中华侨就有 29 人，约占黄花岗 72 烈士的

1/3。

第三，宣传革命道理，发挥巨大鼓动作用。为了反对“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在海外宣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主张，扫除民主革命的一大障碍，各地华侨纷纷资助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党人创办报刊，如东京的《民报》、美国的《檀香山新报》、新加坡的《中兴日报》、曼谷的《暹华日报》、仰光的《觉民日报》、印尼的《吧城日报》等，同保皇党在报刊上激烈交锋，使一些支持改良派的侨胞转而同情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参加革命的华侨还很注意向国内同胞宣传，如邹容 1903 年在日本撰写了《革命军》一书，新加坡陈楚楠、张永福等将这本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最激烈的著作改名为《图存篇》，印刷了 2 万册，有一部分寄给国内各省府州县的官绅和北京的大臣们。特别是清朝最大的军舰“海圻 (qí)”号于 1911 年 8 月 5 日访问古巴时，古巴“三民阅书报社”等华侨社团，特地印制题为《海圻军人听者》的传单，利用上舰参观和水兵登岸看戏的机会向他们散发和演讲，鼓动海军官兵参加革命，收到很好效果，“海圻”号返抵上海后，即响应武昌起义。

2. 华侨支持伟大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由于 1925 年 5 月 15 日上海日本纱厂枪杀工人顾正红，打伤十多名工友，激起上海人民的愤恨。5 月 30 日英国巡捕又开枪屠杀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因在租界集会游行声援工人斗争）的群众十多人，于是 6 月 1 日党组织领导全市工学商界 30 万人左右的罢工、罢课和罢市斗争（工人的罢工坚持了 3 个多月），史称“五卅”运动。它揭开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序幕。

海外华侨积极声援这次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首先是捐款 200 多万元救济罢工的同胞，这是坚持了一百天斗争的重要条件之一。印尼泗水市的“华侨外交后援会”、

日本神户的“中华会馆”、美国三藩市的“美洲华侨筹赈祖国失业工人慈善会”、巴拿马的“筹赈祖国工会”、澳大利亚的“澳洲雪梨中华商会”等侨团成绩也很突出。

广大海外华侨通过集会、游行、罢工、通电等方式，声讨日、英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五卅”惨案消息传到日本东京、大阪、横滨后，华侨立即召开紧急大会，愤怒控诉帝国主义血腥罪行，表示“誓作国人之后盾”。法国华侨商人关店一天以示抗议，不少旅法侨胞戴孝 7 日致哀。在德国的华侨和留学生，由朱德同志（当时国共合作他担任国民党旅德支部组织主任）领导，与英帝国主义喉舌——路透社对“五卅”运动的造谣诬蔑，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3. 华侨是祖国八年抗战的坚强支柱

(1) 华侨抵制日货运动。

1937 年 7 月 7 日芦沟桥事变后，海外侨胞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热忱达到了高潮，抵制日货运动是一个重要内容。以南洋群岛侨胞抵制日货运动为例，其目标不仅是禁止日货的经销与使用，而且呼吁华侨同日本人经济绝交。这个运动一开始就有坚强的组织和领导，如以中华总商会为核心，并成立抵制日货的专门组织，新加坡、马来亚华侨组织了“抵货会”和“锄奸团”，菲律宾华侨工商界成立“抗敌后援会”，缅甸建立“缅甸华侨抵制日货总会”等等。

抵制日货运动，对消费者来说是拒用日货，不买日货；对经营日货的华侨商人来说是断绝一切同日本人的经济贸易往来，他们自动封存商行的日货，宣布定货合同失效，这对日本厂商无疑是当头一棒。如日本生产的“朝日牌”啤酒，向来在泰国畅销，抵制日货运动后，酒馆就改用英国虎牌啤酒，尤其是“一切的中国饮食店，凡日本的麦酒都在抵制之列”。

抗日救亡组织还号召广大侨胞开展“不合作运动”、“不供

给运动”，这是抵制日货运动的另一种形式。如吨位大、吃水深的日本货船抵达曼谷港口，需要华侨的小型驳船驳运，由于侨胞的抵制，日货无法上岸，对日泰贸易和泰国经济影响不小；1937年马来亚日本人经营的矿山、种植园雇用华工17万多人，“不合作运动”开始后，他们不顾自己失业和暂时生活困难，拒绝为日本人做工，甚至迫使丁加奴州甘马挽一家日资大铁矿关闭。

（2）华侨筹赈运动。

“七七”事变后，1000多万海外华侨掀起赈济伤兵难民运动，将出钱献物作为自己应尽的义务。1937年8月15日，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在新加坡成立，著名侨领陈嘉庚先生被推选为主席。接着马来半岛各州相继建立分会，仅半年时间，新、马爱国华侨就捐款2000万元（法币）。为了建立华侨抗日救亡斗争的统一战线，1938年10月10日来自马来亚、缅甸、爪哇、北婆罗洲、西婆罗洲、苏门答腊、菲律宾、安南、暹罗等地45个华侨团体的代表共164人，会集于新加坡华侨中学，举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为“南侨总会”）的成立大会，选举陈嘉庚为主席，印尼侨领庄西言和菲律宾侨领李清泉为副主席，这是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空前盛举。

欧洲华侨在1936年9月18日成立“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芦沟桥事变的当天晚上美国纽约华侨立即建立统一的华侨救亡组织“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当时有3万华侨，不到半年就募集赈款100万美元，以及药品、冬衣和士兵们所需的其它日用品一批。

华侨的筹赈运动成绩卓著：钱财方面，自1937年7月到1941年初，华侨捐款26亿元，无偿购买公债2.5亿元，共计28.5亿元，平均每月6000万元以上，而当时全国抗战军费每